

千磨万击还坚劲

【中】

吴铎回忆及回忆吴铎

李彦 吴小铁 整理



目录

第八章 政治逆转（1957年4月—1958年11月）	(1)
一、整风、反右派运动和张烈问题	(1)
二、《未息的风波》起风波	(5)
三、“秘密会议”和“闭灯跳楼”	(19)
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9)
五、常委会听取工会情况	(41)
六、省委调查组	(47)
第九章 为斗争而斗争	(55)
一、工会居心不良，要犯大错误	(55)
二、毛主席视察辽宁，第二次见周总理	(74)
三、《辽宁日报》关于扩大的省委整风会议的报导	(76)
四、整风期间辽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情况	(82)
五、山雨欲来风满楼	(91)
六、“党性的发言”和“整东北人”	(102)
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06)
八、醉翁之意不在酒	(113)
九、省委书记和常委们的发言	(125)
第十章 “政治上幼稚狂妄”	(158)
一、因忠得咎，以直招祸	(158)
二、孙洪志造谣与工会党组当众扯谎	(180)
三、董雨航“解放思想”和对王、杜等的揭发	(187)

四、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5)
五、沈越斥责：“谁叫你批评这些人呢？！”	(221)
六、落井下石，蔡黎、焦若愚等的揭发	(228)
七、逆潮流而战斗	(243)
第十一章 “火线入伙”的反党分子	(286)
一、大会复会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	(286)
二、扣帽子和打棍子	(290)
三、“孙悟空大闹天宫”与“自作聪明”	(310)
四、横眉冷对千夫指	(317)
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341)
六、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同志”	(350)

第八章 政治逆转

（1957年4月—1958年11月）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69页

一、整风、反“右派”运动和张烈问题

1957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省开展了整风运动。

当时，我分工负责联系指导鞍山市的整风运动。在对鞍山市的调查中，有的市委领导反映，虽然经过发动，但人们对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还有顾虑，怕事后给“穿小鞋”，发言提意见的很少，大鸣大放没有搞起来，形势沉闷。为了打破僵局，鞍山市委领导中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先动员一部分人，带头发言和提意见，给他们交待政策，给他们吃定心丸：只管提意见，不论提什么意见，都不秋后算账。通过他们把大鸣大放的气氛和形势搞起来。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卑劣，很下流，只有政治流氓才会有这样的伎俩。这样做，是预设陷阱，诱人上钩，是一种欺骗。骗得一时，却骗不了一世。如果真的这样做下去，将来还会有人相信共产党吗？“狼来了”的故事，就会重演。我毫不客气，否定了这个坏主意。

在反“右派”运动后期，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确定“右派”名单，戴“右派”帽子时，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可能的保护同志，尽可能的少划“右派”。当时，省委基建部的一位同志因为发言提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

言辞很尖锐，让一些人听了很不舒服，因此，这位同志被列入了“右派”名单中。在讨论这位同志时，我做了很多工作，向其他常委全面介绍这位同志的情况，一再强调看一个同志，不仅要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更要全面的、历史的看待，最后，使这位同志未被打成“右派”，免除了他的一场灾难。但是，全省还是打了很多“右派”，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使很多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被打成“右派”，蒙冤受屈，失去了为国效力的机会，受尽屈辱和摧残，不能不说是一件极为痛心的事情。

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忠正耿介、直言敢谏的老同志被打成“右派”，每当听到“右派分子”中出现一些熟悉的名字时，都令我特别难过。我在东北军学兵队和石友三部队工作时的战友和同志刘靖宇、伊洪被打成了“右派”。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曾任中共大连市西岗区委书记；1947年1月，任旅顺市委书记。1950年6月，刘靖宇调外交部工作，先后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副司长、代司长等职。二战结束时，苏美英签订《开罗协定》、《雅尔塔协定》，三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撇开中国，不顾中国也是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将中长铁路直到旅顺口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联出兵东北的交换条件，满足苏联自沙俄时代以来在东方谋求不冻港的扩张野心。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若干内容有损中国之主权。由于旅大地委以及后来外交工作的经历，使刘靖宇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嘴脸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苏联侵犯中国国家主权、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耿耿于怀。在整风运动中，刘对中苏关系提出意见，强调既要发展友好关系，又要维护国家主权，不能为了友好而损害国家利益，甚至国家主权。这些意见为历史以及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却为大的风向、大的潮流所不容。当时，我在一篇党内情况上看到了刘的上述讲话，看后即觉情况不好，刘肯定要受到冲击。不出所料，不久，反“右派”运动搞起来后，刘被错划成“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处分。1963年，刘靖宇调国家轻工业部基建局工作。“文革”中，刘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4年2月20日含

冤去世，终年57岁。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刘靖宇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5月3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辽宁省反“右派”运动中，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知识分子有两万多人，其中不少是各级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这对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都是一场人间悲剧。其中，级别高、影响大、牵扯面广的“右派分子”，当数时任省委常委、省工会党组书记、省工会主席的张烈同志。在省工会党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蛊惑下，张烈被错误地打成极“右”分子、坏分子、政治野心家，被迫自杀身亡。受其牵连，省工会一大批领导干部，各市工会系统一大批领导干部也被打成张烈反党集团，遭受打击和迫害。不仅如此，省工会党组某些人在“要抓大的”叫嚣声中，将黑手伸向省委，在省委扩大的整风会议中，在某些省委领导的支持、怂恿下，以“包庇极‘右’分子张烈”为由，把另外一些省委领导打成“反党宗派集团”，制造了辽宁自并省以来规模最大的、持续了二十年的一起冤假错案。

在整风初期，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对省委领导之间的矛盾，我早有所知，看到一些领导借助整风之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另外一些领导同志当作敌我矛盾加以斗争，我不能坐视不问。抱着主持公道、公正的思想，在大会上，我在与其他代表交换意见中，在小组长联席会议上以及大会发言时，对某些书记发言中的错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对大会的错误方向提出批评，为错误地被批判斗争的同志们辩护。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反“右派”斗争势不可挡的潮流下，个人的抗争是太渺小了，反倒把自己卷入其中，成了“火线入伙”的“反党宗派集团活动分子”。对此，我在整风大会上的检讨中，认为自己是“因正直而犯错误”，是犯了“正直的错误”，政治生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还是从这场错案的源头——张烈的冤案说起。

1957年春，省委在旅大举办哲学自修班，我参加了学习。

在旅大期间，王铮邀我一道去看望郭峰同志。当时，郭峰因高岗问题受牵连，受了处分，被下放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见到郭峰后，我和王铮询问了他在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说在工厂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好，厂里同志对他的工作都很支持。我劝他不要因犯了错误就消沉，要敢于讲话，看到

回忆录

工作上有不对的地方，要主动地向组织提出建议。

学习期间，我和省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董雨航住同一间宿舍。董和我是1936年底在北平相识。当时，我代表西安东北军学兵队在北平招收新学兵，董是那批新学兵之一。因为他年龄较大，我便委派他做联络员，并给他买了一台旧自行车，由他联络、通知散居各处的报名青年。我和董虽然相识二十多年了，但一起工作时间很短，招收学兵工作结束后即分手，对董了解并不多。但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在辽宁省委工作期间，董雨航经常到我家里来。

旅大学习期间，董向我反映省工会主席张烈的问题，包括锦州剧团导演蔡冰伯问题，纠正李双林工资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及其它问题等等。关于张烈问题，后面还要介绍，此处不予详述。

这里，要简单交代一下省工会情况。当时，辽宁省总工会主席一人、副主席七人，主席是张烈，省委常委，副主席傅承铭（女）、董雨航、张沐庭、徐中岳、金硬、申醒民、王哲（女）。傅承铭是老资格，当年已经五十多岁，入党前是印刷工人，是不多见的工人阶级出身的老党员，和当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常委帅孟奇是老战友，过去曾一同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傅在中央部门有许多老熟人，张口闭口“中央如何如何”，“某某中央领导对我说”，“告到中央去”，“打到中央去”等，是个手眼通天，呼风唤雨的人物，虽然能力不强，职位不高，经常养病，但有中央这层关系，傅承铭在辽宁省内，颇受人尊敬，不要说一般干部，就是省委第一书记，也要尊其为“傅大姐”，高看一眼。金硬是我在北平东北中学的校友，但接触不多，前几年我在鞍山工作时，金也在鞍山工作，才有所了解。

在省工会，以张烈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和以董雨航、傅承铭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在工作问题上有分歧，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以后，新闻部门介入，由记者写出了《未息的风波》小品文。在这篇小品文里，记者就工人医院反对中医师李双林用中医治疗阑尾炎提出质疑，对傅承铭等人在这一事件中仗势欺人、胡作非为提出批评。这篇小品文原名是《一手遮天的老干部》，写作时间正是反右派时，因原名锋芒毕露，迫于形势改为后来的名字。这篇小品文被送到工会党组征求意见。傅承铭到黄欧东处“告状”，说张烈暗中组织和发动“右派”记者搞了小品文，对其诬蔑和诽谤。黄欧东在扩大的整风会议上发

言时，就小品文问题说：“《未息的风波》，我说不能发。很明显，这个小品文是吹嘘李双林的，是打击傅承铭同志的，说傅反对李双林就是违反中央中医政策的。我那时的思想，肯定这个东西是张烈搞的鬼。事情很明显，几个记者要放毒，打击一个工会副主席，不告诉工会主席，是不会的。肯定是张烈授意的，张烈是企图利用这个把傅大姐压下去，这是很明显的。”黄欧东书记指示张烈：“《未息的风波》不能发表；李双林的技术要调查，李双林的历史要审查，工会党组在李双林问题上有分歧，要召开党组会议解决。”在反“右派”运动中，《未息的风波》的三位作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二、《未息的风波》起风波

小品文《未息的风波》是张烈的主要问题之一，被省工会党组傅承铭等人指责为“由张烈组织、新闻界‘右派’分子抛出的反党的大毒草”。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毒草”，引证如下，请读者自己去分辨。

《未息的风波》作者给张烈的信：

张烈主席：

关于李双林治阑尾炎的事，你不会不知道。这样说吧，我们很气愤卷在这个事件里的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言行。然而，我们等待着，一直等待着，希望那些人能够猛醒过来。事情愈扩展愈大，黑手几乎要唱凯歌，赞扬他们遮天盖日的工夫了。这样，我们还能沉默么？我们写了这份材料，为了订正事实，曾翻修数次，现呈交与您。望您妥善处理，挽救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不必多说了，不写，是痛心的；写完了，仍然痛心。

祝您

健康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 于雷 郭峰

沈阳日报记者 王千

1957年5月7日

未息的风波

1957年3月26日,《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同时发表了一条消息:东北工人医院中医门诊部主任李双林医师用中药治阑尾炎,不用开刀,治愈率在90%以上。不久,《香港大公报》、《中国新闻》、《中苏友好报》等,也都先后发表了这一消息。

这一消息很引人注意,因为患有合并症的阑尾炎患者不适宜开刀,可是不开刀又怎么办呢?假如中医服药能治,岂不对患者造福匪浅?例如最近经李双林治好的一位阑尾炎患者,是苏联专家。他患阑尾炎已经二年多,因有心脏病,不敢开刀。他听说李双林能治,便特地从长春赶来,原想住在这里治几个月看看,万没想到,吃中药五六天就好了。

李双林治的效果到底怎样呢?

这一个月来,李双林派了些人到患者家去访问、调查,据统计,只是中医门诊部治的,有三百名左右。其中,有百余名是外县的,不好调查,在本市的已经调查了一百六十多名,只有几个人治后见好,但因别有缘故,又开刀了,余者尽数全愈,没有一名愈治愈坏的,或是出了什么伤亡,患者均写了材料,盖了章,千恩万谢,这都笔笔有卷可查。

然而,近日,在辽宁省政协会议上,有一位身负要职的人竟说:他亲自去医院视察,发现中医治过的59名阑尾炎患者中就有8名,经中医治后,病情恶化。他用指控的口吻,建议当局查办这类倾人害命的“坏人”,并将这一发言刊在《辽宁日报》5月4日上,报纸是给全国人看的,这当然就是要让全国人知道这个骗人的医生了。

那么,到底是救死扶伤,还是倾人害命?李双林是该法办,还是应该受到鼓励与保护?我们愿意提供一些片断的事实和看法,纵使极其片面,极其谬误,对于领导上周密考察问题,也许不无益处。这就是我们敢于冒犯嫌疑,甚至触怒一些位高望重的人,也不愿意沉默的原因。

我们三人之中,一人是记者,二人是编辑,本材料的来源,有的出之于采访,有的来之于见闻。再说一遍,我们讲的不是医学上的功过,而是态度上的是非。

两种面色

李双林全家有七口人是中医。他们能够加入东北工人医院，是由于蔡兆奎的赞扬和傅承铭的推荐。

蔡兆奎是某贸易公司的经理。他亲口对我们讲过：抗战时，因在水里着凉，患全身麻痹症。上半身从不出汗，掏一把也觉不出疼来；两腿没有知觉；头上也不长头发，四季都要戴帽子。前几年，他还与王化南同志一同在陆军医院住院，行动都要坐手推车。1955年冬，他开始在李双林的诊所治病，不出几个月，据他自己讲：上半身直到胸口，已经能出汗了，两腿恢复了知觉，也长了头发。于是，他就为李双林宣传，并且介绍了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到李双林那里治疗，他的老战友，省总工会副主席傅承铭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李双林自己说是家传三代的中医，他制药有特点，在全国也少见（我们暂不妄断虚实）；并兼他原来坐落在一个卫生条件极不好的缩脖大院，门口只挂着两张牌子：一个是“济康中医诊疗所”，一个是“应诊男女四时杂症”，但是病人却有增无减，患关节炎的、高血压的、癌瘤的、肺结核的、妇女病的，医大一院、二院和妇婴医院把西医老在治疗的重患者介绍到李双林这里来治。也许这件事引起了蔡兆奎的注意，他便恳托傅承铭副主席向东北工人医院介绍。后来，傅主席去北京养病，就由蔡兆奎向省总张烈主席推荐，于1956年10月，由全家医药人员成立了东北工人医院中医门诊部。

在这以前，蔡兆奎是极力扶植李双林的。其后，蔡兆奎也极够“朋友”，差不多每天都坐在那里。院部评薪了，他说：“嘿！才评那么点，若我在场，一定不能这么少。”李双林治阑尾炎有了成就，他建议记者采访；李双林要在院部报告治阑尾炎的经验，他现求他的朋友——药学院的尹鲁赶了一夜，才在报告材料之前添上了巴甫洛夫学说的道理，蔡兆奎说：“现在办什么事都得有政治！”李双林自然是感恩不尽。

傅主席自北京归来，也常来李双林家串门或是看病，而且介绍过她的亲友老少来治过病，直至今时，傅主席像蔡兆奎一样，都给李主任留下一个亲切的笑容。

回忆录

狂风巨浪是突然来临的。有那么一天晚上，傅主席和李双林翻了脸，经过如下：

那是李双林在院部做了第二次治阑尾炎的报告之后，他应邀到了傅主席家里，心情像往常一样地轻松。可是他一进门，就看出傅主席满脸怒气，开口就问道：“李老大夫，咱们谈过多少次，没听你讲过巴甫洛夫学说，你几时学的？！”李双林立刻明白了，这指的尹鲁在报告上添上“政治话”那件事，本想解释一下，但傅主席没容他发言，就接连地说下去：“告诉你，在毛泽东领导下都得实事求是，不然，都得砍头！”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老头子吓坏了，他不一定经过脑子，便批评自己：“是我的错误，怨我一点政治也没有，可是，人家蔡弟是一片好心……”“谁是你的蔡弟？！”傅主席的这话可问恼了李双林。本来平常亲切地称道“蔡弟”、“傅大姐”，怎么忽地来了这样大的下马威？于是他也在盛怒之下说：“就是蔡——兆——奎，主席不认识么？”这下更触怒了傅主席，于是就说：“你不用厉害！”接着就宣布了罪名：保守、资产阶级思想、卖假药、欺骗政府，像美国一样……

“我得怎么办呢？”老头子觉得事情太严重，面对这位发怒的高级领导，旧社会的阅历提醒了他，他胆战心惊了。

傅主席这样指点他道：“人，走人道，不能走牛马道，不然，就带上夹板用鞭子打！”

“那么，到底我怎么走呢？”

“这样走！”傅大姐一面走个样子做示范，一面说：“要往前走，往两边晃一晃就得打，若往后退呀，就叫你住‘清凉屋’，门口放两个站岗的。你站在什么地位，要不要改造？”

老头子毕生行医，没有受过这样挫折，他把不满化为顺从，说道：“好！一定照主席那样走！”

据说，老头子回家的时候，吓得面色惨白，几乎上不去楼梯。第一次随他去看老干部的女儿惊奇地问我们：“你们不是说领导特别和气么？咋这样呢？领导就是这样么？”

就在傅主席教训了老大夫的第二天，蔡兆奎来了，面色不比傅主席的面色好多少。

“工薪评完了？不行！太高！马上就往下降！看我老蔡说了算不算？！”

有一天，蔡兆奎打电话逼着李双林给治一个病人，这位病人患先天性睾丸萎缩症，医院和名医韩致远、黄大夫都一致认为没有希望。李双林表示治不了这种病，蔡兆奎火了：“谁把你整上来的？不认人了？光认得穿红的，不认得挂绿的？铁打衙门流水官，你惹不起他。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

前面说的是傅主席头一天晚上发怒，第二天蔡兆奎就发了脾气，这回蔡头一天用不治之疾逼人，第二天傅主席就来电话责难李双林：“特诊室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不治病（实际上那个患者已经取过药了）？不认人了？以后病人死了也不找你！”看看，这岂不是一里一外，一唱一和？从此以后，老头就没有不挨骂的日子了，蔡兆奎和傅主席仿佛是用车轮战的方法训斥老头。李家人整天心惊肉跳，无路可寻；老头则常常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有泪珠滚滚，才觉得出他还活着。

有那么一天，傅主席又来电话了，说：“你治的阑尾炎有四个开刀的，小肠黏连一尺多长，是一个长征干部……”老头一听就慌张了：“傅大姐，是谁？叫什么名字？”傅主席怒道：“谁是你的傅大姐，你还这么老混蛋呵？报纸没有通过我们领导就发表消息，谁叫你发表的！弄些狐朋狗党，替你吹嘘。告诉你，你若不老实，就叫你四儿子媳妇（刚离婚）去斗争你，分你们的财产，斗争你的老婆，叫你蹲‘清凉屋子’……”

前后两种面色，对照一下看，区别多么显著，一副是笑容可掬的脸，一副是怒气冲冲的脸。傅主席说：过去是由她的老战友蔡兆奎替李双林吹嘘，把她也“吹”得相信了。现在蔡兆奎已经醒悟了，她同样不相信李双林了。

这是可能的，盲目相信了一个人，后来识破了，就不再相信，这本是常情，不足奇怪，奇怪的是领导对待下级的态度（指傅），和威胁人作威作福的行为（指蔡）。再就是李双林是否要被捕，傅主席怎么知道？蔡兆奎又如何得知？就算知道，这样威吓李双林岂不等于给被捕对象通风报信？而且党解决政治问题，就算李双林有政治问题，难道就可以任意辱骂么？在学术上本应该虚心探讨的，难道可以用恐吓代替研究，用暴怒代替批评么？何况，从那副热情的笑脸变为阴冷的怒容，中间只隔几日，就算这几日之内两位老同志做过学术上的和疗效上的调查研究，能那么就给一个老医师做出学术上的结论？就算做

出了十分正确的结论，难道就该采取这样一唱一和的辱骂态度？

在变脸的中间，在那短短的时日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大事呢？蔡兆奎为什么一再提到“认得穿红的，不认得挂绿的”和傅主席为什么气愤地讲“不认人了”。

几件小事

有一天晚上，蔡兆奎的爱人到李双林那里去取药，偏巧省总张烈主席的爱人也去取药。给蔡兆奎爱人带回的药里有牛黄。李双林曾对蔡兆奎说：“真牛黄透甲。”蔡兆奎就试验了是否透甲，用以测验李双林是否真心相处。偏巧，那牛黄是土产公司新近发的代用品——人工黄，并没有透甲，蔡兆奎就有点“醒悟”了。

又有一次，是张烈主席去北京之后，张主席自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劝李主任继续钻研。这里补几句，张烈主席曾在院部几次做报告，号召中西医团结，特别是表扬了李主任入院后的积极努力与成绩，号召西医向李主任学习。偏巧张主席自北京来电话，蔡兆奎在场，他神色一变说：“张主席可真关心你们哪！”

最大的两件事，是李双林没有帮上蔡兆奎的忙。李主任不愿意讲那两件事，他说：“兴他不仁，不兴咱们不义呵！做事要给人留一步，不可太绝情！”可是，有那么一次，他忍不住地对我们说了：“有一天晚上，蔡弟领了个女人来，要住在我这里。我老婆在里屋和我吵，‘咱家不是旅馆，住在这里像什么话？’蔡弟听见了，一直坐到半夜，只留下那个女人，他一个人走了。还有一天，蔡弟托我给借个房子，要山沟里的独门独户，上山可以打猎，他要去休养三个月，我答应了。事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个女人，想到了他家有爱人，就又拒绝了他。紧接着，事情就糟了。”

蔡兆奎“发觉”李双林厚张薄蔡，便搬弄是非，通过傅主席的职权，便搅起了混浊的风浪，企图像过去让老头膜拜于他的神通广大一样，再让老头慑服于他的赫赫威风。于是，恩人立刻转为仇人，笑脸立刻变为怒容。

傅主席的思想工作

医学是科学，尽管傅承铭副主席对李双林从政治压力开始，但是，要想真的给李双林“戴上夹板”或“坐清凉屋子”，那还要在医学上揭露他。而在医学上揭露他，就要击中要害，揭露他治阑尾炎的事。像作战一样，在开始这场学术斗争之前首先要派出工兵，扫清障碍，傅主席先批评了岳院长不经领导批准就给予李双林三级医师的待遇，如果情形确是这样，这是应该批评的，所以傅主席狠狠批评一下“无组织无纪律”，虽然别有含义，倒也没有批评错。张烈主席走后，比较注意李双林医术的是岳院长，可是不久，傅主席就给他假休息去了。还有何支书，自从傅主席批评他帮助李双林解决家庭纠纷是管闲事，降低党的作用之后，他也冷淡起来了。相对的，原就不满中医治阑尾炎的戚院长（技术院长）和后派来的王院长，都得到了支持。医院之外，成为傅主席进军障碍的，就是舆论界。报社发表过的消息，因为没有通过省总领导，傅主席说是“狐群狗党”们替李双林吹的（实际上，记者做过了调查）。广播电台曾预告，要播送记者访问李双林的消息，傅主席一再给两位台长打电话，电台就临时撤了这条消息。据傅主席自己声称，她还从省委李荒书记那里得到了指示：“不要再给李双林吹了！”于是她就决定打通记者的思想。3月18日，下班之后，一位女同志跟着她到李双林那里去检查制药，她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呵！”正赶上我们之中的两个人（包括在傅主席所说的“狐朋狗党”与蔡兆奎说的“虾米小鱼”之内）坐在那里，她就邀两个人立刻到她家里谈话。

无原则的吹嘘是万不应该的。不吹嘘就得实事求是。傅主席这样讲了她的计划与决心。她说：

“学术问题嘛！我们可以慢慢观察。我们可以组织沈阳市的中西医讨论，有不少医生反对他嘛！不久，医学界就要出现个李万铭了，快要真相毕露了！”

傅主席又极有感情地说道：“李双林偷偷地给我送过20斤猪肉……是糖衣炮弹呵！可要警惕呀！我的好同志们哪！我对他们好些，他们对我不错呀！可

回忆录

是对党不利呀，我的好同志！”

我们相信傅主席这番话是充满了党性精神和阶级感情的。看看她那久经风霜的脸面，穿着有些磨亮了的青布棉袄、棉裤，那双三撇脸的旧棉鞋，不辞辛苦，业余去了解情况，热情邀请我们的联系群众的作风，那坦率的谈吐，爽朗的笑声，亲手打苹果皮的慈祥态度等等，在我们面前就立刻出现了一位党性极强、艰苦朴素、对人又和善又亲切的妇女长辈，一代的老革命者的印象。

不过，我们总是难于相信李双林治阑尾炎和李万铭有什么联系，也想不通傅主席要在什么样的气氛下开那样的会？叫做“斗争会”是否比“讨论会”更准确些？

这次谈完话，接着蔡兆奎就邀我们之中的一位同志谈话，正是傅主席的那番话的复述，故不重复。

不管怎样，我们对傅主席、蔡兆奎这样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是充满了敬意的。因此，我们按照傅主席的指示，第二天就到中医门诊部，去稳定李双林的情绪，可惜，差了一步，李双林避难去北京了。

戚院长的建议书

已经没有什么阻力了。一如傅主席所说的，在科学技术上的“考察”开始了。是什么样的考察呢？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善意地帮助李双林找出教训？还是为了寻找足以使他蹲“清凉屋子”的罪证？照我们的理解，更确切些说，应该是“攻势”开始了，而不是“考察”开始了。

戚院长在今年3月31日曾经写了一份《关于停止中医治疗阑尾炎的建议书》。

傅主席在组织关系上给戚院长撑了腰，戚院长给李双林做医学鉴定，就壮了胆；戚院长在技术上给傅主席找到了论据，傅主席就更有胆量给李双林的反对方撑腰。而这一切又都是使站在圈外的蔡兆奎心满意得：叫老李头尝尝“认得穿红的，不识得穿绿的”的后果。戚院长打印出来分发给全院（就不给李双林）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那些事，不妨在这里提一提。

一、李双林的药里以西医成药为主。并且用了大量的“磺胺”（消炎剂）和“鸦片”（麻醉剂）。

只讲阑尾炎吧。李双林为了农民着想，曾想将药方交报公开，医院未准。药方里有“阿斯匹林”（经过长期临床经验，只有此剂中用此可代替价值昂贵的麝香），还有其它中西药，并无磺胺和鸦片。也可以算算外行账，李双林自去年底至目前，已治过五百多名患者（阑尾炎）。低估用了一万六千服药。就是按每服阿斯匹林的剂量一分来算，一万六千服就要用十六斤鸦片。试想：李双林有什么办法弄来这十六斤鸦片？每付药才卖一角至二角钱。如果用了那么多鸦片，其它所有药也都用鸦片，那么，李双林赔得起么？

然而，戚院长是邀了几个医生一同化验的。我们是相信戚院长的科学？还是相信事实？

二、指出名字的有四名（患者）吃中药后重新开刀，诬称吃中药黏连严重，不能手术，有的造成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

这四名重新开刀的，一直是李双林受责难的关键事实，其中可能就包括傅主席讲的黏连一尺多长的长征干部。很难理解的是西医开刀时为什么拒不通知李双林。李双林曾一再要求经中医治过又要开刀的，在开刀前通知一下，以便与西医共同会诊，并且学习西医开刀的知识。但是院方从未开此方便之门。更难理解的是：事后也不道出名姓。李双林曾问过傅主席，傅主席骂他：“还那么‘老混蛋’。”问岳院长，岳院长说：“当初没问。”

李双林想，就是死，也得弄个明白吧！为什么一直不告诉姓名呢？这里不妨把戚院长指名的四名开刀患者，经门诊亲自检查的情况扼要记下：

栾怀德：在东陵疗养，患阑尾炎后，因本人有肺结核症不宜开刀，吃李双林的药见效，硬块亦消，现已回东陵疗养院休养，前几日还来取过药，本无手术之事。

刘金香：女，18岁，学生，患急性阑尾炎，有限局性腹膜炎型。2月5日入院，白血球12,200，7天出院，白血球7,000，后因本人运动时跳高过剧，阑尾炎复发。入院后经中医服药又见效。后来因家人和西医主张手术，未通知中医开刀了。

朱玉泰：男，22岁，南湖电车公司，急性阑尾炎，有局限性腹膜炎型。2月9日入院，12天治愈，出院，白血球由11,900降至7,600，后来没有通知中医便开刀了。

还有一名至今找不到下落。

这是治五百余名阑尾炎患者之中的四名。喧嚷了一个多月，李双林连姓名都问不出来。经调查情况就是这样。

科学是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而大讲其科学的人却未必实事求是，以掩盖他们的私人怨愤。

王院长的成绩

不久之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院部邀李义大夫去会诊。李义大夫去时，手术台已经摆好了，要给阑尾炎患者开刀，这位患者经李智（李主任四儿子，才十八九岁）给治过，李智吓得泪水与汗珠并流。他明白这将给全家人带来什么下场。省总傅主席特意赶来参加。她对在场的人们说：“大夫们哪！这是治耽误了吧！是拿生命开玩笑呀？”王院长说：“大姐呀！这还是小的呢，往后你再看吧！”傅主席连称：“好！好！”在一个过道上，傅主席小声赞扬了王院长：“真能干……这才叫成绩呢！”王院长欢喜地说：“有，这才一个！”

傅主席和王院长的心情，总是不难理解的吧！这显然是摆了个使“李万铭”“真相毕露”的阵势。李智更慌了，忙着去找病志，根据病志记载和病人口述，他吃中药本已基本见好，可是后来因断了半个月的中药，是他爱人叫他来开刀的。这就是被抓来当作吃中药几乎害死人命的一例，也是院部当场试验的唯一病例。西医张主任向大家做预报：“一会儿就要抽出黄脓来了！”可是抽出来却是红色的血水。李义问道：“这就是黄脓？”张主任答得很俏皮：“若不开刀，就要变成黄脓了。”

李家兄弟急于见识一下盲肠，可惜一位大夫掏了好多时，急得汗水如雨，却找不出盲肠来。张主任指点他说：“在这堆肠子下面嘛，那不黏连了！”又是“黏连”在一堆肠子的下边，怎么就能看得出！并且看见黏连？真得佩服张主任的眼力，这且不提。到底盲肠是什么样子？怎样才叫黏连？被邀请见习的兄弟二人没见盲肠，恐怕谁也没看见，便推肠入腹，便结束了这一场手术。

李双林治阑尾炎可能不成功，隐瞒失败，会像扼杀他的发明创造一样的罪过。可是单讲这样的做法，我们很难赞同。为什么不摆到明处呢？为什么不摆